



【北京访老乡之三】

## 孔德懋： 平民味道中的贵族范儿

□李木生

曾经相依为命的“小弟”，于1949年去台后就再也没能踏上故土。而今“小弟”故去也已6年。姐姐思念的惆怅里，该是有着痛惜的吧？



◀2011年，孔德懋在北京家中向来访者介绍孔子76代嫡孙孔令贻画像。

民族命运的血脉。我甚至想，她生命的美丽与柔和，更多得益于纷至的苦难与平民的元素吧。

她的老祖宗孔子不就是一个布衣、一个教师吗？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直到他与学生们赶着牛车流亡列国，“累累若丧家之犬”的老境，一生中不得志的时间倒是十有八九。还有她的母亲，那个叫王宝翠的姑娘，就是因为是正夫人陶氏的丫环，被父亲收纳为妾，一生只能处于挨打受骂的被欺凌的地位，并在屈辱与痛苦里早早离世。而她自己婚姻不幸，饱受折磨，等她离婚独自拉扯着4个儿女时，已经是贵族不吃香的新中国了。岂止是不吃香？曾经拥有的孔子嫡裔的光环，会一下子成了遭罪的“华盖”，罩得日子灰灰暗暗，跌跌撞撞，连安心做一介平民也不得。挖防空洞，从火车上卸石灰，下砖窑烧砖，扫大街，为人家洗衣服，她“什么都干，无一不干”。也有饥饿的岁月，为了孩子们的生存，她甚至卖掉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好在她六十多岁的时候，也因孔子过上了舒心的日子，连续当选第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任中国孔子基金会副会长，还曾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正式代表，参加了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让她有着幸福感的，还是此后一次次光耀地回到老家曲阜。曾是她的孔庙、孔林、孔府，又在热情地迎候着她。

知道她想家，可如此高龄，已无法经受路途的劳顿，只能在梦里与家乡相遇了。我注意到她暂时停止了谈话，见她仰视的目光正专注于我们所坐的沙发背靠的南墙上，我知道，她是看那幅装裱已久的书法，她在思念“小弟”孔德成先生了。曾经相依为命的“小弟”，于1949年去台后就再也没能踏上故土。而今“小弟”故去也已6年。姐姐思念的惆怅里，该是有着痛惜的吧？我站起来，顺着孔老湿润的目光，默读那苍凉的诗句“风雨一杯酒/江山万里心”。还有那首“小弟”早年专门写给她的诗《怀二姐》，更是如脉搏一样会与生命共始终了：“黄昏北望路漫漫/骨肉相离泪不干/千里云山烟雾遮/搔首独听雁声寒。”

(本文作者为知名作家)



悦读·分享

扫码关注齐鲁晚报副刊微信“青未了”。

先是头天晚上打电话相约，是孔德懋先生的小儿子柯达接听的。知道第二天老人要去医院检查心脏，第二天整个上午我们都心存不安，毕竟老人已是97岁高龄。摄影家孙伟一遍遍地翻动摄影包，已是急形于色。倒是书法家孙旭灵动，说如下午就去敲门看望，没人就坐在门口等待老人归来。

怕她午休，我们选在日头偏西的时辰前去。我曾去过两次，甘家口、增光路，不用看小本上的记载也知道。谁知下了出租车，左找右探前寻后觅，竟如大海捞针。来来回回的，一个多小时转眼溜走，走得累了，还笑着调侃自个儿：“咱们还有汽车坐，要是乘孔子周游列国的牛车，那不得咯噔咯噔从头发黑走到头发白？”

终于找到，敲开了门，是柯达。“孔老在吗？孔老好吗？”听到我土得掉渣的济宁话的问候，人未见，声先出，“木生来了，木生来了！”标准的普通话，嗓音仍然清脆圆润。我赶紧扶她在小客厅靠北墙的单人沙发上坐下，一边打量这位孔子第77代唯一健在的嫡裔，一边忍不住发出由衷的感叹：“孔老，咱4年不见了，您几乎没有变化！面色红润，还有这样多的黑发，嘿！”听了这话，老人家慈祥地笑了，幽默地自嘲：“我是没心没肺。”笑容里露出从容，语音里透着底气，连那虽然稀疏却向后梳得根根分明的头发，都还隐隐闪着光泽。

这是用一个世纪的时间锻造出的生命的美丽，这是无数苦难的风雨陶冶出的生命的力量。依然有着细腻亮光的额头下，那双微眯的眼睛，仿佛正越过尘世的烟云，眺望着遥远的时间深处。

她住着全国政协的公房，面积也就是六七十平方米吧？我拿出刚刚出版的我的散文集《人之歌》给她看，指给她看封面上题要中的一行：最后的贵族孔德懋。这篇文章里有这样的话：“北京有着入云的高楼大厦和如云的达官贵人，可能会笑话她的七八平方米的客厅和客厅里沙沙地吹着的风扇吧？可是又能怎样呢？就连那片黑压压的故宫，也不敢心存小觑之意的。威风盖世的皇家，总会走马灯似的更迭，一个朝代一二百年的寿命就是了不起的了。可是孔子及其家族，却是两千年来如江河一样蜿蜒不衰。当孔子赶着他的牛车在中原大地上播撒文明的种子的时候，这座‘古’都的诞生地还是荒草丛生的吧？是的，因为狭隘，坐在客厅里不大的沙发上，甚至都不能自在地伸腿。就在这样的沙发上，93岁的老人，侃侃而谈着孔子，脸上漾着祥和的神色……”

岁月毕竟不饶人。不动声色间，孔德懋女士已经久别故土，在这座古都里熬过了80个寒暑。苦乐参半，悲喜交集，圣裔的血管里，流淌着的，早已不再是纯粹血统意义上的传承，而是混合着贵族与平民生活、杂糅着家庭与

【域外走笔】

## 礼节与个性

□董庆利

最近，我所在的英国组的首席研究员招了一个本科刚毕业的英国男生来做一个小课题。男生20岁出头，金发披肩，旧T恤，破牛仔褲，青春逼人，英气勃发，眼中写满恃才傲物。而我们的首席研究员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是一名极度严谨、有明显强迫症的单身主义英伦绅士，按照中国的标准，已是年近花甲的老者；即便从学术上讲，首席在他自己的专业领域也称得上绝对的国际权威。

就是这样一位前辈级人物，和小男生交流课时，从来都是一把年龄的首席从独立办公室出来，站在或坐在男孩的旁边，进行连续几个小时的交流。很多时候，小男生似乎爱理不理，但争执起来丝毫不示弱，满桌的文献稿纸被画得张牙舞爪。

茶歇时，小男生从不喝咖啡，也不加入我们的闲谈，独自喝着酸奶，俨然与我们这帮中年“大叔”界限分明。回到办公室，有了新想法就喊首席的名字，从不主动去汇报，然后首席就大步流星疾步走过来。这让已经习惯于中国式尊老爱幼的我替首席愤愤不平。

不过这一老一少似乎从来不在

乎，半白头发的首席总喜欢抓着花镜站在男生桌前谦逊倾听。这幅画面与我的愤愤不平，也许就是传说中的文化差异(Culture Gap)。

试想一下，如果男生是在中国，没准他已经成为办公室的“边缘化”人物，甚至是领导眼中的“异类”，即便智商超群、才华盖世，从此也许不再受重用，甚至在漫长的“冷宫岁月”中自生自灭。当然，我们也有可能就此少了一位未来的国际权威、知名科学家。

我从小深受“尊老爱幼”这一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熏陶，并在日常生活中身体力行，在某种意义上，这与英国的绅士风度并无实质性区别——既是一种文明礼仪，更是一种文化素养。老首席和小男生反映出的，则更多是中英之间对于个体、个性的尊重与包容程度的不同。说到底这是社会文明程度和人们思想观念开放程度的差异。但正是这种差异，影响的也许是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整体创造力。

毫无疑问，创造力、创造性思维总是与个性相伴而生。能够说明两者之间关系的例子实在太多，那些唐诗宋词的名家才子，几乎个个都极具个性甚至浪荡不羁。当代的天才式人物，比

尔·盖茨、乔布斯等皆属于此类，即便是那些普通的科研工作者，我们也可从美剧《生活大爆炸》里窥见一斑。就我从事的科研行业的同行而言，也大体能反映这二者的关系。

个体的创造力得到怎样的发挥与舒展，能不能上升成为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创造力——中西方之间因为对于个体与个性尊重包容程度的不同，而在整体创造力上的差距越来越大，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据我观察，在英国的公众场合是没有所谓“异类”的，只要你的行为不违反社会公德、公共规范和当地法律，你可以尽情展示个性，哪怕你创造性地认为自己来自火星，别人也会对你的创意投以善意的笑容甚至欣赏与鼓励。而在中国的街头，你可能会被认为是神经病，被异样眼光围猎。

一个社会的整体创造力都是由每一个个体的创造性思维汇聚而成。没有对社会个体的尊重、对个性的宽容与鼓励，很难有整体创造力的提升。

反观我们国内的环境，从基础教育开始，培养的重点已不是创造性思维能力，而是怎样能够考取高分、取得将来能够更好踏入社会的通行证以及

怎样“为人处世”，这种入世哲学思维的训练甚至会陪伴我们终身。直到有一天，我们步入中年，锐气尽失，圆润中庸，人情练达，在进退之间游刃有余，依靠经验主义与半世经营的资历成为各个领域所谓的前辈与领军人物，不过，伴随而来的也许还有创造力的丧失。这也是当下中国的一种很好的个体自我保护方式，姑且美其名曰“情商”。

对于五六十岁的中国人来说，很难想象乔布斯在五十几岁的年纪仍然可以打破电子工业的指挥棒“摩尔定律”，用经验主义与创造性思维的完美结合，重新引领一个消费电子领域的新时代。

回到开头的小男生，年少轻狂也好，恃才傲物也好，这些只是成长的阶段，与个性的好坏、创造力的大小并无直接关系。没准到了老首席的年纪，他也会成长为一个谦逊和气、绅士风度的业界大牛，用老首席的方式与那些小男生们交流，并分享不同年龄层次的智慧和成果。

(本文作者为上海理工大学医疗器械与食品学院副教授、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访问学者)